

第六章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第一节 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 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一 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和财政经济的开始好转

建国初期的形势和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从此，在我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但是，建国初期的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在国际上，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激励了许多类似中国这样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的人民，增强了他们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可是，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抱敌视态度，它们仍然以各种方式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扼杀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国内，国民党反动派还盘踞在西南、华南和台湾省，妄图以重庆、广州为基地卷土重来。国民党的特务、间谍和土匪、反革命分子的

破坏也很猖獗。在新解放地区，土改尚未进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仍然很尖锐。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不断发动内战的摧残，国民经济已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一九四九年的工农业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重工业下降了百分之七十，钢年产仅十五万八千吨；轻工业下降了百分之三十，棉布年产只有十八亿九千万公尺；粮食降低了四分之一，年产只有二千一百六十二亿斤，棉花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八，年产只有八百八十九万担。工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城市失业人数达四百多万；农村水利失修，灾荒严重，有四千万灾民需要救济；加上国民党统治时的长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造成了一九四九年我国财政的严重赤字，国家财政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因此，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尚未完成的任务，大力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开展各项社会改革，促进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成为建国初期摆在党和各族人民面前的主要任务。

人民解放军继续进军，全国大陆的统一 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建国以后必须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部队，摧毁残存的一切地方反动政权。为此，中央军委指示各野战军在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进军，全部歼灭祖国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遵照这一指示，人民解放军奋勇作战，全歼了白崇禧残部和胡宗南主力，先后解放了广州、桂林、乌鲁木齐、贵阳、重庆和成都，并和平解放了云南和西藏两省。到一九四九年底，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了残留在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大陆国土。一九五〇年，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海解放了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十月，人民解放军又开始向西藏进军，并解放了通向西

藏的战略重镇昌都。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举行谈判，五月下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至此，除台湾、澎湖等岛屿外，全部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整个中国大陆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的统一。

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 在摧毁旧政权后，党领导各族人民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由于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稳定，反革命残余势力还相当猖獗，党中央决定在新解放的地区首先实行军事管制，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城市和乡村。军管会在城乡充分发动群众，摧毁国民党反动地方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民族自治政府，开展剿匪反霸斗争，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建立革命秩序。由于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因此，党和国家决定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一种过渡形式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到一九五一年三月，全国有二十三个省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百分之九十四点八的县，也都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调动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密切了各级人民政府同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没收官僚资本 新中国建立后，党依靠国家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到一九四九年底，人民政府没收占旧中国工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共二千八百五十八家，拥有工人七十五万多人。这样，一九四九年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

所占的比重达百分之四十一.三，其中国营经济拥有全国发电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原煤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八，生铁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二，钢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九，棉纱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这就为确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经济基础。

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稳定物价 建国初期，在国民党统治下形成的投机资本，趁着国家财政经济的困难，凭借他们在市场上占有的经济力量，捣乱金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为了战胜财政经济的困难，稳定物价，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同投机资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首先，加强了对金银外币的金融管理，禁止金银外币的自由流通，对非法的金银投机活动与机构严加取缔。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查封了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操纵市场、破坏金融的投机奸商二百三十余人逮捕，分别给予惩处。其次，控制主要物资，集中抛售。国家加强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收购和调运工作，迅速聚集了大量物资，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沈阳、西安等全国各大城市采取一致行动，大量抛售物资，这就使投机资本家无法招架，物价迅速下降。再次，加强对市场物价的行政管理。国家将足以带动市场物价的主要物资置于政府的监督和指导之下，集中进行贸易；保护国营商业的牌价成为市场上领导的价格，对没有牌价的商品采取议价核价制度；对少数敌视人民政权、带头哄抬物价的投机资本家则依法制裁。通过这些斗争，打退了资产阶级投机势力的猖狂进攻，初步稳定了物价，基本上确立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为了更有效地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必须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适应各解放区被敌人分割和独立作战的环境，党对财经工作采取政策上统一领导，业务上分散管理的方针。建国后，全国在地域、交通、物资交流以及币制等方面已经统一，但是公粮和税收大多数尚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种情况，已不能适应全国统一市场管理和对国营经济实行统一领导的要求。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研究统一财政经济问题。三月三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地使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第二，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棉布、工业器材等从分散状况集中起来，以便调剂供求和控制市场价格，对投机资本作有效的斗争；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减少市场上货币流通的数量，增加国家能够运用的现金。这三个统一，使全国的财力物力统一集中于中央，它对于平衡收支、稳定物价、扭转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还统一了全国税制和加强了税收工作，采取了核实编制、清理仓库、控制投放、节约开支等项措施，并发行了一部分公债。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购买胜利折实公债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人民政府。

由于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以上各项措施的实行，国家财政收支迅速接近平衡；四、五月间，物价下跌并趋于稳定。这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

二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

在国家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财政经济开始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党中央为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确定当时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策略，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到九日，在北京举行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七人，并有各省、市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四十三人。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了重要讲话。全会还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外交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报告》、陈云《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报告》和聂荣臻《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会议着重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书面报告。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后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8页）实现了这三个条件，就能够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为了创造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做好下列八项工作：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调整税收，合理调整工商业；在保障有足够力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精简和整顿行政机构；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失业工人和失业知

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

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社会各阶层的动态，着重指出，要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他说：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党在建国初期的战略策略方针，阐明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路线。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为全党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毛泽东的书面报告和讲话，是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献，它对于巩固人民革命胜利成果，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抗美援朝和各项社会改革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正当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一九五〇年

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接着，又把美国第七舰队派往我国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国纠集十五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 轰炸我国安东 今丹东 等地。

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迅速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高举起‘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正义旗帜 于十月二十五日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我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在全国范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于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就在全中国掀起。朝中人民军队经过五次大规模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我方进行停战谈判。美国侵略者不甘心于失败，谈谈打打，几经较量，连遭失败，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三年战争中，朝中人民军队毙伤和俘虏了敌人一百零九万多人，其中包括美军三十九万多人，击落击伤和缴获敌机一万二千多架，击伤击毁和缴获敌坦克三千多辆，击沉击伤敌舰艇二百五十余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由，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保障了我国经济恢复工作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它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抗美援朝的同时，广大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旧中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一般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他们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土地，他们忍受着地租、赋税、徭役、高利贷的残酷剥削，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不可能实现。为此，党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后，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党中央向会议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同意了这个草案，并作了若干修改补充。六月三十日，由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作为全国土地改革的基本指导文件。从一九五〇年冬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土地改革中，党制订并贯彻了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正确路线。其中，依靠贫雇农和团结中农是党在土地改革中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对于富农，在新解放区的土改中采取了中立政策，这是由于革命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我们的工作重点已由革命战争转为恢复国民经济；富农的政治态度一般地也比以前有了改变。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早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由原来征收富农多余土地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在土地改革中，认真贯彻了有领导地发动群众的方针。各地每年组织了人数达三十万以上的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培

养贫雇农积极分子，逐步地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组织形式和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

在发动贫苦农民的基础上，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工作。在划分成份时，在农民内部充分发扬民主，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允许个人自报和反复争辩，由群众审议评定。最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在划分阶级、分清敌我后，对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罪行，则发动农民群众起来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清算，并对其中的恶霸分子和坚决反对与破坏土改的分子，由人民法庭进行惩处。

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就着手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耕畜、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征收寺院、庙宇、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分配土地是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办法，按人口统一分配。分配后，还进行复查，颁发土地证，整顿和加强农村政权和民兵组织，引导农民发展生产。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土地改革的发展极为顺利。到一九五二年底，除西藏和其他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尚待解放的台湾以外，全国土地改革工作已基本上完成。这就使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七亿亩土地和其他财产，免除了过去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的七百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倒了封建统治势力，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

恢复和发展，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镇压反革命运动 党在领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被推翻的反动势力并不甘心失败，潜伏在我国大陆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到处制造谣言，刺探情报，破坏厂矿，捣毁铁路，抢劫物资，杀害干部，甚至进行武装暴乱。朝鲜战争发生后，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狂。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党于一九五〇年三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六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镇压反革命的任务。十月，党发出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从十二月开始，逐步在全国展开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一年二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给干部和群众以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对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党贯彻了三条原则：第一，实行群众路线，广泛而深入地发动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使专政机关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第二，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集中力量打击那些罪大恶极、怙恶不悛、为人民所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于罪恶尚不十分严重又愿意改悔的反革命分子则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第三，领导机关严肃认真，谨慎细致，注重调查和证据，不搞逼供信，贯彻“既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又不冤枉一个好人”的精神，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

到一九五二年底，镇反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次运动集中打击了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加强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使抗美援朝有了安全的后方，使土地改革、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合理调整工商业和“三反”“五反”运动 在我国社会经济改组中，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困难，从一九五〇年五、六月起，全国开始对工商业进行调整工作。调整工商业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

调整工商业的工作到一九五〇年秋就胜利地完成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经过调整，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各得其所；既利用了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因素，又限制了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因素，并把私营工商业初步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从而，使私营工商业恢复了正常生产和经营，并有了某些发展。到一九五一年，全国私营工业生产总值比一九五〇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九，私营商业零售额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六。这对于增加市场商品供应，扩大就业人数和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调整工商业取得初步成效后，党发出了增产节约的号召。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 增产节约”的方针。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指出：“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逐渐暴露

出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群众团体内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十二月，党中央发出必须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于是在党政军民内部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三反”运动开展起来后，发现这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同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相联系，他们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方式向国家和人民猖狂进攻。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又于一九五二年一月指出，必须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在“三反”运动中，党充分发动群众，掀起一个群众性的检举运动。同时，明确宣布一切贪污分子，除罪大恶极者外，如能作自动彻底的坦白，则重者可以酌予减罪，轻者可以免予治罪；如果还能检举其他贪污分子，则可视情况将功折罪。在“五反”运动中，党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和其他市民，同违法的资本家斗争。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充分体现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对于大多数情节较轻或彻底坦白的贪污分子，从宽处理；对于极少数情节严重恶劣而又拒不坦白者，予以严惩。对于工商业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

宽，投机商业从严。并根据有无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轻重大小，违法性质恶劣程度及坦白悔改等基本标准，把私人工商业分为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类，分类作出处理，从而争取和改造了多数资本家，孤立和打击了少数反动资本家。同年夏“三反”“五反”运动先后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进一步牢固地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极大地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加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建立了工人群众对私人企业的监督与管理，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它对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是一次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社会上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它也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对旧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造 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是极其落后的，它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是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服务的，它不能适应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所以党有步骤地谨慎地对它进行了改造。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就确定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大众开门的总方针。在学校中废除了训导制度、国民党党义等反动课程和宗教课程，开设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课，建立了政治思想教育制度。接着，在抗美援朝的斗争中，政府又接办和处理了一批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势力。一九五一年十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确立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教育在各级各类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保证了城乡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从此，一大批培养工农干部和工农子弟的工农初等学校、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学校和各种业余补习学校，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且在工厂、农村开展了群众性的扫盲运动。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又进行了院系调整。经过这一系列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有文教事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促进了新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一九五二年，全国小学生有五千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多；中等学校学生三百余万人，比一九四九年增加一倍半；高等学校学生二十万人左右，比一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以上；各级工农业余学校入学人数达二百三十余万，参加速成识字法推广试验学习的人数有七百余万。

在对旧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改造的同时，党为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做了许多工作。一九五一年十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全国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后，思想改造就从教育界、文艺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一九五二年秋，知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它对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以及一定程度上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组织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纯洁了知识分子队伍。但由于有些单位要求过高过急，某些问题处理比较粗糙，所以损伤了一些知识分子。

四 整风和整党运动。国民经济的恢复

整风和整党运动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党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已经是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党的队伍也壮大了，已成为拥有四百五十万党员的大党。绝大多数党员坚持和发扬了党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工作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但是，也有一些党员，滋长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作风。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增强党与人民的联系，顺利地完党面临的各项繁重任务，党中央于一九五〇年发出了关于整党的指示和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这次整风的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整风的主要任务是要纠正命令主义作风，加强党同城乡全体人民群众的联系。整风的基本方法，是由上而下地逐级召开干部整风会议，或成立整风训练班，学习中央指定的有关文件，结合检查和总结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经过半年多的整风，各级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善，党和人民的联系有了极大的加强。

结合整顿党的作风，同时对党的组织进行了整顿。全国胜利后，一方面，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小部分人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在发展党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又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收为党员，并有极少数坏分子钻进了党内。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不纯的现象。这种现象如不克服，党将很难顺利地领导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的更伟大

的历史任务。因此，党中央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在刘少奇主持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并根据新的情况，制定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对党员教育的基本内容。会议决定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在三年时间内对党的基层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顿。整党中着重于思想整顿，对党员进行八项条件的教育，要求党员对照党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对于已发现的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予以清除。对于犯有各种毛病的党员和根本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分子，帮助他们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和缺点，在未经充分教育前不过早地作组织上的处理。对于拒绝党的教育，或教育确已无效的消极分子，经过妥善的办法，使他们退出党的组织，或开除他们的党籍。在他们离开党的组织后，仍耐心教育他们，团结他们。到一九五四年，全国规模的整党运动基本结束。党在整顿原有基层组织的同时，还着重在工厂、矿山、企业、机关、专科以上的学校和完成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农村，积极而慎重地进行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从一九五〇年底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全国共接收了一百零七万新党员，党的支部由一九五〇年底的二十四万多个增加到三十二万多个，全国各部门有更多的基层单位有了党的支部或党员，新党员中产业工人、雇农、贫农和手工业工人成份占了大多数。

经过整党和建党，提高了广大党员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壮大了党的队伍，使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分布更普遍，党与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和统一，战斗力更强了，这就保证了各项社会